

區域主義研究與國際關係理論

曾 怡 仁*

摘 要

本論文主要目的是試圖透過回顧與評析歐洲一體化研究到目前為止學術界所累積的各種不同研究成果，作理論層面的分析，希望藉此對區域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能有一翻新的體會。本研究發現每一理論有不同的目標價值與不同的問題討論面向，並沒有絕對的對錯，僅在不同的時空裡，適用上的解釋力可能會有不同而已。大體而言，區域主義的理論研究基本上還是免不了受到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影響，國際關係研究所歷經的四次大辯論，在不同程度上均刺激了區域主義研究的發展。同樣地，區域主義研究也忽略了一些非主流的國關理論觀點，包括新馬克思主義、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理論以及史翠菊（Susan Strange）的結構分析途徑等等。這些非主流理論對於區域主義研究而言，都是值得開發的新領域。

關鍵詞：區域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歐洲一體化

* 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壹、前言

1980 年代以來國際政經秩序的顯著現象之一，就是區域主義的再度興起與深化發展。歐洲整合在經過 1970 年代的相對停滯之後，1986 年「單一歐洲法案」以及 1992 年「歐洲聯盟條約」的簽訂，象徵歐洲一體化進程邁入另一個嶄新的階段，並促使美國改變其對區域主義的看法。傳統上美國是支持多邊主義，但當歐洲經由一體化深化發展而逐漸成為足以和美國經濟力量相抗衡實體時，美國對區域主義興趣也日益增長，試圖透過採取雙軌戰略（twin-track）來平衡多邊主義與區域主義（Regionalism），即一方面提出「開放的區域主義」作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基礎，另一方面推動美洲自由市場計劃，如此可將西半球的區域主義發展納入自己的控制，並以此來制衡歐洲一體化的影響，進而維持多邊主義的目標。毫無疑問，美國的這些戰略計劃促成當前世界經濟以三個地區經濟組織為主體的三大板塊狀態，即歐洲板塊（歐洲經濟共同體）、美洲板塊（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東亞板塊（亞太經合組織）。此外，以這三大板塊為主體同時存在著許多次區域主義（sub-regionalism）的發展，如美洲的拉美南部共同市場、與歐洲緊密聯繫的一些非洲區域經濟集團、東南亞國家聯盟，以及其他更小形形色色的經濟增長三角（或多角）合作區域，如中國大陸南部的珠江三角洲、東北亞的圖門江三角洲和新加坡-馬來西亞柔佛州-印尼廖內群島（SIJORI）增長三角等等。

事實上區域主義的實踐並非 1980 年代以後才有的現象，十九世紀末到二次戰前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鬥爭就已經形成了相互排斥對抗的經濟貿易保護集團。而戰後的 1950、60 年代除了歐洲經濟整合的進展外，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拉美國家），為了維護主權的完整以及避免經濟遭到核心國家的剝削，乃採行進口替代的國家發展策略，並籌組相對封閉型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然而與這些舊的區域主義相比，80 年代以來的新區域主義不再侷限於經貿、主權或安全等議題，它還涉及人權、民主、兩性平權、環保和社會正義等多樣目標。新地區主義也不再堅持對主權的不介入性原則，如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後，泰國外長提出的「靈活接觸」政策，就體現了這種趨勢。此外，新

區域主義更配合全球化的發展採行程度不一的經貿自由開放政策。最後，新區域主義超越南北關係界線，出現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共同建構區域主義的新現象，這些發展新趨勢當然也再次激起學者對區域主義研究的熱潮。¹

區域主義能推展至今日的階段是一非常複雜的過程，我們無法僅以單一的理論來清楚的描述整個事實的經歷過程，或者正確的說明不同事實之間的因果關係，更不用說能對未來的發展趨向做出準確的預測。其實這是社會科學研究所共同存在的問題，而不僅限於區域主義的研究上，不同的理論常僅是針對不同的時空議題或同一問題的不同面向作申論，而無法面面俱到。更何況理論又常涉及意識型態的信仰問題，每位研究者在蒐集資料或採用分析架構時，很難做到價值中立的要求。此外，理論與事實之間也存在著雙向的互動辯證對話關係，理論是從具體的事實作抽象演繹或歸納來提出簡約的分析概念或架構，然而事實不會永遠固定不變，其變遷可能會使原有的理論失去解釋力，這反過來會要求理論作修正或創新；另一方面，理論也可能規範事實的發展方向，因其可能作為政治精英的決策參考依據或為其政策合法性背書。因而社會科學研究由於個人受到時間與精力的限制，想對某一事實有較完整的了解，可以權宜地採行一種理論間的比較研究方式來進行。這種做法的優點是：從事實層面來看，各種理論的比較研究可以幫助研究者認識到不同的問題或同一問題的不同面向，以及經由時間的演進那些問題變的比較不重要，而當前或未來又可能面對那些新問題的挑戰；而對理論層面而言，比較研究可以進一步了解各種理論的特點並找出彼此間的同質性與差異性，所採用的本體論或認識論研究方法到底有何不同，以及各種理論所存有的解釋力及侷限性。特別是按照理論大略出台的時序劃分成幾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作階段內與跨階段的比較，這有助於更清楚地、有系統地認識事實與理論的多面性與變化性，以及事實與理論之間的辯證發展關係。

如前所述，區域主義的發展並不限於西歐，然而不論是實踐的進度或理論的探討都比其他區域來的豐富，同時基於上述比較理論研究的特點，本研究的

¹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Summer 1999.

主要目的就是試圖透過回顧與評析歐洲一體化研究到目前為止學術界所累積的各種不同成果，作理論層面的分析，希望藉此對區域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能有一番新的體會。

本文二、三、四部分將依序把歐洲一體化進程大略分為三個階段，即 1960 年代中期以前的源起和發展階段；19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葉間的相對停滯階段；以及 1980 年代中期以來的進一步深化發展階段。然後檢討各階段不同整合理論對一體化進程的觀點，這些一體化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及一體化論述借用與調整國際關係理論之後的解釋力等等問題。而第五部分則是思考區域主義研究還可以從國際關係理論裡汲取那些養分，以及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區域主義研究是否需要提出新的分析架構。第六部分為結論。

貳、早期一體化階段

從二次大戰前後到 1963 年法國戴高樂總統拒絕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的申請，以及 1965 年 7 月 1 日撤回法國駐共同體理事會部長，用所謂「空缺（空椅子）危機」來干撓共同體向聯邦主義方向發展，主張國家主權至上以及堅持歐洲聯合只能是政府間的合作，反對建立超國家機制和實行多數表決體制為止，這段期間有關歐洲一體化的闡述主要包括聯邦主義（Federalism）、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溝通交流理論（Communication Theory）、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以及政府間主義（Intergovernmentalism）等等。針對這些不同的觀點，過去學者已經作了許多的比較研究或後設分類，譬如依照國際理論通常的劃分法將聯邦主義歸為理想主義；政府間主義歸為現實主義；以及新、舊功能主義與溝通交流理論歸為自由主義的觀點。另外有些學者按照推動一體化進程中的主導力量差別而分為由國家、社會或者超國家機制主導發展的國家中心主義（如政府間主義）、社會中心主義（如新、舊功能主義和溝通交流理論）以及超國家主義（如聯邦主義）等三大類的論述。這些不同的後設分類研究有助於從不同角度來共同來拼湊一幅更貼近「事實」的歐洲一體化圖像，然而如果先將過去的分類研究方式暫時擺一邊，重新思考歐洲早期一體化

的相關論述，可以發現至少還具有如下幾項特點：

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冷戰爆發後，以莫根索為首的現實主義一直在國關理論中佔據主流的支配地位。相對地，對歐洲早期一體化問題的研究中，卻是聯邦主義與功能主義這些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觀點率先作出回應，這是因為一體化這一新主張或現象與傳統現實主義的觀點格格不入，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反思和調適後，它才能在1960年代中期對一體化作出理論的解釋（例如政府間主義）。造成這種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歐洲人在歷經兩次大戰的浩劫後對於戰爭的感受和美國人不一樣，如何避免戰端再起維持歐洲和平穩定，以及戰後如何加強彼此合作來完成經濟的重建工作是他們的核心關懷。相對地，二次戰前由於國際聯盟追求國家間和平穩定的目標失敗後，美國國際關係思想家以及政治領袖就已開始失去對理想主義憧憬的信心，以更現實的態度面對國際政經新秩序，而戰後其關心的則是如何領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蘇聯東歐集團對抗，建立霸權地位，這些處境和追求目標的差異必定會影響兩者對於國際政經秩序的看法。

一些主張聯邦主義的歐洲政治思想家或實踐家在二次大戰前後就認為國際聯盟失敗的主因乃是其太強調國家主權與政府間的協商體制，而戰爭主要是起因於民族國家間的衝突，因而戰後的歐洲有必要建構超國家機制，並將國家主權逐漸的轉移至此機構當中，其理想的目標就是建立聯邦式的政體。另一方面，功能主義者也是著眼於主權問題的處理，雖然對於歐洲國家間的未來關係是否有必要發展成類似聯邦化的政體持開放態度，但均認為各國政府面對急速增多、日趨複雜的非政治性、純技術性的事務，將迫使各國政府必須依賴專業人員來解決問題，而其中許多問題的解決非各國合作難竟其功，如此國際間各種專業的合作及組織即應運而生，並不斷擴大本身的功能，最後甚至可能取代政府若干功能。²密特蘭尼（David Mitrany）並提出「分枝（ramification）」的說法，認為某個專業領域的合作會促成另一個專業領域的合作需求，最終也會

² David Mitrany,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World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XXIV, 1948, p. 359.

滲入政治事務的範圍。這種合作關係的持續延伸，有助於世界和平的維持。³簡言之，聯邦主義主張經由組建超國家機制以限制民族國家主權的行使；而功能主義則是認為國際專業功能組織將逐漸地取代各國政府的作用，因其已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這兩種對歐洲整合的看法無疑和強調國家主權、國家利益至上，以及國際間衝突不可避免的現實主義基本假定無法相容。

第二、聯邦主義與功能主義實質上是分別對歐洲一體化實踐的兩個主要方面，即目標和動力機制問題進行闡釋，因而彼此之間的理論爭議不會也不可能演變成實踐中的方法與思路的對立，相反地，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補充的，可以共同為歐洲早期一體化進程提出合理的解釋。如果說某一特定時期其中一種理論比其他理論較有解釋力，那是因為這一理論更貼近當時的現實，或更容易為當時的人們所接受。聯邦主義者認為一體化的最終結果將是建立一個嶄新的聯邦化國家或政體，因而他們關注的焦點是如何組建超國家機制，而較少對一體化進程的動力問題作系統性的思考。然而如何導向聯邦化的途徑畢竟是無法迴避的問題，到底政治聯合應先於經濟聯合，或者相反？為什麼主權國家會同意建立這樣的超國家機制而限制自己的權力？事實上針對這些問題，法國聯邦主義的先行者和組織者莫內（Jean Monnet）就主張，以不挑戰國家主權的方式建立國家之間特定的功能性聯繫，特別是經由經濟活動，將逐漸打開通向聯邦的大門。⁴這和功能主義始祖密特蘭尼（David Mitrany）的觀點有許多相似之處，只是密特蘭尼對於聯邦有頑固的敵意，他要走的道路是徹底的技術化和非政治化。

同樣地，功能主義論述中也可發現有著理想主義的色彩，其認為可將政治運作邏輯和經濟運作邏輯分離開來，並且各部門間的功能性合作需求將會自動決定組織的形式並賦予適度的權力，最終按照功能分別組織起來的技術化管理的國際市民社會將會出現，這時人們對於主權國家的忠誠或認同也會轉移至超

³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6), p.97.

⁴ 莫內也因這種看法而被評為僅是一位聯邦的倡導者，而從來就不是一個聯邦主義者。見 Michael Burgess, *Federalism and European Union: Political Ideas, Influences and Strategie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1972-1987*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51.

國家機制。⁵實際上經濟事務很難脫離政治影響，並沒有所謂純經濟事務，經濟的運作常須政治的支持，而經濟資源的分配必也涉及政治性的競爭。況且政治該如何整合、何時整合以及整合後的制度形式為何等等問題都須經政治性的協商過程，以及政治精英的主動意願，而不會如功能主義所期待的僅是單純經濟技術合作後的自動「溢出」或「分枝」結果。最後，人們對於國家的認同並非僅是基於經濟利益的工具性考量，同時也是心靈的歸依所在，並不是那麼容易就會改變其認同對象。再說對於民族國家與超國家機制的認同是可以並存的，不一定非得要兩者擇一。

第三、如果以 50、60 年代國際關係理論中傳統主義與科學行為主義有關研究方法的爭論來看，歐洲早期一體化的各種論述中，聯邦主義與功能主義屬於前者，而溝通交流理論及新功能主義則是屬於後者。相對於功能主義者密特蘭尼認為，人類社會本質上是和諧的，因為對大多數人而言物質需求是最重要的，而滿足需求的工作常是大家必須共同面對的，因而為了需求的滿足而進行合作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新功能主義者哈斯（Ernst B. Haas）則是採行較現實的功利主義利益政治概念，並不認為人類社會天生就是和諧的，行為體之間在利益上的分歧和衝突才是人類社會的本質，每一個人都在追求自己利益並設法使利益最大化，絕不會自發的獻身於所謂的公共利益。⁶簡言之，新、舊功能主義在研究方法論上的主要差別，就在於「利益」與「需求」兩個不同詞彙的使用上。功能主義的一體化是基於技術管理的需要而自發產生的，而新功能主義的一體化則是利益主體追求自身利益而有意發起和實施的。同時，新功能主義以系統論的概念分析指出，各國政策為輸入項，國際組織本身為國際體系之結構，而組織之集體決議為輸出項，且該輸出項將會回饋而對各該國間之整合產生重大影響。⁷新功能主義的這些觀點毫無疑問是受到 50、60 年代國際關係

⁵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ondon, 1943), pp.39-41.

⁶ 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Univ. Press, Stanford: CA, 1964), p.34.

⁷ Ernst B. Haas, *The Web of Interdepende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 1970), p.106.

理論中科學行為主義研究方法發展的影響。

歐洲早期一體化理論中除了上述的新功能主義外，杜意奇（Karl W. Deutsch）的溝通交流理論某種程度也是採用科學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他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一個有組織的群體而非烏合之眾，其中溝通是凝聚群體成為組織的關鍵因素。因此，不像功能主義單純從上層組織結構或功能合作效益作為評估整合程度之標準，溝通理論更重視的是實質的交流關係，包括貿易、投資、政黨和政府官員等不同社會階層的交流，藉以增加彼此的互信，建立共同價值理念，進而形成一種「共同體意識（sense of community）」，而這才是影響一體化進程的主要決定因素。⁸杜意奇特別著重闡發作為國際一體化發展模式之一的「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概念，認為其是指已經被一體化的人們所形成的整體，而一體化意指一定區域內的成員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和相應機構與運作的完善足以使成員確信較長時間可以預期的和平變化。基於這種理念杜意奇更多地分析了所謂的「北大西洋區域」國家可能形成的安全共同體，而不是歐洲共同體，因為在他看來聯邦主義和功能主義者所關心和討論的集中化機構建設問題不過是已經一體化整體的局部調整。⁹我們可以發現後來歐體執委會就是依循杜意奇的研究方式，自 1974 年起即按照交流方面的具體內容設計問卷題目，定期舉行社會暨民意調查（Eurobarometer），作為歐洲整合程度及效益的參考和依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杜意奇的溝通理論與 90 年代發展的建構主義觀點有著明顯的淵源關係，但溝通交流理論並沒有把社會意識強調到作為方法學上的本體論程度，而僅是經由交流產生變化的因變量。而對晚近的建構主義理論而言，體現社會意識的觀念、規範、理解等則是成了自變量，變成了本體的內容。

第四、歐洲早期一體化理論的爭辯到了 1960 年代中期以後就以代表自由主義觀點的新功能主義和代表現實主義觀點的政府間主義之間的對話而定

⁸ Karl W. Deutsch, *Political Commun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Problems of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Chicago: Doubleday & Co., 1954), p. 33.

⁹ Karl W. Deutsch,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J), p. 5.

調，成爲兩種對立的主流論述。同時無論新功能主義對國內政治因素作用的強調，還是政府間主義對國家政治領導人角色的重視，都顯示出現實主義觀點在區域主義理論研究中的影響逐漸增強。以新功能主義而言，既然其認爲利益天生就是衝突的，而一體化是實現利益間的妥協和引導各方追求共同利益的手段，因此整合過程中使各個利益團體都能得到不同的利益滿足是整合基礎，如此他們也才會支持超國家行動。¹⁰同時各國的政治精英共同致力於整合比功能性組織的專家更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國際組織並不會因專業知識而具有改變其會員國政策的能力。顯然這些看法已對傳統功能主義的理想主義色彩作了修正，而有了現實主義的考量。但問題是如果出現跨國家的問題和某種要求的話，社會的利益團體是否有能力動員各種資源來要求國家解決？或者政府是否必然會回應民間利益團體對一體化的要求？顯然新功能主義沒能回答這些問題是因其對政府偏好缺乏足夠重視的結果，而這也正是政府間主義所要處理的問題。

政府間主義把一體化看作是一個地區的主要國家政府首腦之間進行的一系列交易或討價還價的結果，他們的政策偏好多會顧及國家主權的維護，這使得各國政府在評估國際合作的可行性時，對國家自主性的問題很謹慎處理，只有在嚴密監督的情況下才會將部分國家職能委由國際機制處理，並且考量的是這些國際機制的集體行動是否有助於國家福利的提昇，或者有助於政府對國內事務的控制，從而有助於政權的穩固，也就是把國際機制當作一種工具。¹¹然而由於政府間主義單純強調政府間的討價還價，而有意忽略發生在討價還價之前的事態，對事後的發展更認爲無關緊要，以爲政府間協議簡單易行，甚至是自動就能得到實現，而實際上很多一體化協議都是在實施階段時，遇到國內社會的反對而失敗的。簡言之，政府間主義認爲國家相對於超國家機制與國內市民社會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性，並且能理性的判斷何謂國家利益，這種看法和國際理論中現實主義的國家中心論立場以及假設國家是理性行爲者相一致。

¹⁰ 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p. 34.

¹¹ Andrew Moravcsik, "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 Winter 1991, pp.25-26.

參、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相對停滯階段

進入70年代西歐國家面臨國內政治與經濟問題的新挑戰，各國政府忙於應付內政的處理而無暇他顧，使得一體化運動長期的相對停滯，僅有1970年歐共體成員國政府間就外交政策進行合作的機制－歐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在此期間形成。以經濟問題來說，過去不論發生經濟不景氣或者通貨膨脹問題，政府總可透過凱恩斯學派的總體經濟管理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增加公共建設創造就業機會等等，來加以解決。一般而言，行政部門特別偏好採行貨幣政策，因其不像財政政策，如增減賦稅措施，須經國會的同意，也不像公共建設須經過長期的時間才會看到效果。當經濟不景氣時，政府可以採行增加貨幣供給的方式來鼓勵投資與消費，進而刺激經濟發展；當通貨膨脹發生時，可以減少貨幣供給來冷卻過熱的經濟，然而70年代以來，歐洲國家所面對的是經濟不景氣中又有通貨膨脹問題，縱使是貨幣政策對此也顯得左支右絀。

就政治社會層面來看，從60年代末期開始西歐國家相繼出現了所謂的新社會運動，包括反越戰學生運動、環保運動、反核和平運動、人權運動、野生動物保育運動、原住民自治運動以及女權主義運動等等。相較於過去的勞工運動，這些各式各樣的新興社會運動是具有跨階級的性質，更是具有身分認同而非單純利益認同的特性。如此，先進西歐工業化國家過去以階級及利益考量為基礎的政治動員方式的重要性降低了，傳統的政黨、議會及利益團體等等這些政治機制已不能全然函納新社會運動的訴求，因而造成西方民主政體所謂的不可治理性危機（ungovernability）。一些學者已經指出，70年代西歐國家政治的不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遲緩是限制一體化進程的主要因素。¹²

這段期間除了是一體化的實踐相對停滯外，也可說是一體化理論發展的蕭

¹² Robert Keohane & Stanley Hoffmann, "Conclusions: Community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illiam Wallace, ed., *The Dyna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Printer, 1990), p. 285.

條時期。這期間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奈伊（Joseph S. Nye）等新自由主義者提出的複合互賴理論（Interdependent Theory）與新現實主義陣營內沃爾茲（Kenneth N. 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和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Theory）之間的爭辯。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歐洲一體化只有在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下來理解才有意義，而忽略一體化自身存在的理由探究。這和傳統一體化理論研究的主流論述，不論是新功能主義或者政府間主義，將其分析層次放在歐共體本身或者各主權國家不同。新現實主義未能將其較宏觀的視野運用到歐共體的問題研究上，對一體化理論的完善與實踐的理解未嘗不是一項闕漏。美國的霸權角色或者美蘇兩極對抗的格局均會影響歐洲一體化的發展，例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曾經很簡潔地指出，歐洲經濟共同體學者的第一項共識原則是：外在的威脅促使歐洲國家更團結。¹³

相較之下，雖然有學者認為對互賴理論（Interdependent Theorh）而言，歐洲一體化也只是整個國際相互依賴關係發展的一部份而已，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而且相互依賴這一概念本身對歐洲一體化來說太宏觀和模糊，並沒有足夠的分析能力，¹⁴但事實上奈伊和基爾漢的互賴理論確實對哈斯的新功能主義作了重要的補充，兩人個別或者共同在1970年代初期曾針對國際互賴與整合之關係議題發表了一些重要的看法。例如，奈伊認為新功能主義所主張的「功能聯繫」並不必然會造成「外溢」的正面效果，也有可能各國透由以往交流或共識的不良經驗，對未來的發展持保留或負面的看法，因而產生「溢回」（spill-back）的反效果。也就是說，新功能主義的盲點即在於並未指出，在什麼條件下或以什麼方式所進行的「外溢」，才能導向有利於整合的方向發展。¹⁵例如，在歐洲整合初期政治精英和利益團體領導者支持功能性合作，但是當經濟發展緩慢時他們的態度就趨向保守，尤其是經濟成長率降低的原因是來自能

¹³ Economist, 10 March, 1973, p. 59.

¹⁴ 陳玉剛，《國家與超國家：歐洲一體化理論比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5。

¹⁵ 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p. 65.

源危機時，各國政府為顧及本身的利益，對提昇共同利益感到猶疑。¹⁶奈伊的「溢回」概念與其早先在《權力與互賴》一書中所提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概念是連貫的，都是站在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上，試圖兼顧現實主義的考量。此外，奈伊亦提出「刻意聯繫 (deliberate linkage)」的概念，認為其不但可以輔助也可加強「功能聯繫」的效果，而「刻意聯繫」是由政治人物，國際官僚及利益團體領導者共同努力造成的，其往往不是因為技術上必須如此，而是具有政治或意識型態上的考量。¹⁷「刻意聯繫」常將不同的問題以包裹的方式處理，在這些包裹問題中一個問題的解決經常需仰賴另一個問題的處理。¹⁸當然「刻意聯繫」並不見得都是有助於整合，也可能會產生反效果，被政治人物操作用來阻止一體化的進展。毫無疑問，奈伊的「刻意聯繫」概念和其學術夥伴基爾漢的國際典則理論 (International Regime Theory)，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強調互賴情境僅是提供國家間合作的前提或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合作與否以及如何合作仍有賴於政府首腦或談判代表的協商或制度安排才能成立。

奈伊對新功能主義最重要的貢獻是其試圖提出可供參考的分析架構模型，首先，其將影響整合發展的因素歸為四大類，即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是否齊一、精英的態度思考方向是否相近、社會多元化程度以及各國國內政治的穩定性程度。其次，在初步整合之後，利益是否均沾、代價是否過高以及各國決策者的評估都將左右整合未來的進一步走向。最後，奈伊認為整個整合過程可以觀察四項特徵：一是政治化，即解決問題及分配利益方式是否改變；二是各國國內各利益團體間的利益重分配狀況如何；三是整合的不可替代性及強迫整合的壓力是否變化；四是各國對外政策漸趨一致的可能性。奈伊這些衡量整合的指標不同於以往的一體化理論僅是單一層次的分析研究途徑，如聯邦主義著重超國家層次、新舊功能主義著重國內層次、而政府間主義則是注重國家層次，

¹⁶ Ibid.

¹⁷ Ibid., p. 68.

¹⁸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gration," in Fred I. Greenstein & Nelson W. Polsby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Addison-Wesley Pub. Company, 1975), p. 384.

其同時牽涉到國內、國家以及超國家三個層次。這對於 80 年代中期以後，新區域主義理論的發展從國際關係轉向結合國內政治的多層次研究方法，可謂是開風氣之先。

另一位新自由主義學者基爾漢後來在 80 年代中期提出國際典則理論，認為國家間政治經濟的互賴現象並不必然導致區域一體化趨向，而是各個國家基於理性自利的思考，彼此間就特定的問題領域建立典則，以求將議題連結來降低交易成本，或提供可信的資訊給各成員國，這才能有助於國際間的合作。同時國際典則理論也將新舊功能主義只集中於國際組織的研究擴大到國際體制、規範、規則與其他非正式制度等更大的範疇來分析，這對於區域主義理論的完善無疑是有助益的。

總之，在這段一體化理論發展的蕭條時期，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學者奈伊與基爾漢扮演了承先啓後的重要角色。

肆、1980 年代中期以來深化發展階段

80 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歐洲單一法案》簽訂，歐體不斷深化發展，這種經驗現實很快推動了歐洲一體化理論的發展以解釋新生現象，同時檢討 70 年代區域化實踐相對停滯發展的原因，並對國際關係理論的適用性提出反省。這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傳統的一體化理論不斷走向「混合」，學者們對於一體化的解釋不再運用單一的某種理論，或者侷限於某一特定層次的分析，而是綜合運用國際關係和國內政治研究，並參考此時國際理論發展的雙層博奕（Double-Edged Game）的多層次分析方法。¹⁹這包括由政府間主義演進而來的自由政府間主義（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以及對新功能主義修正的辯證功能主義（Dialectical Functionalism）理論。第二、一體化研究的核

¹⁹ Andrew Moravcsik, "Introduction: 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in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liforni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心概念由「利益 (interest)」轉向「認同 (identity)」的討論。隨著一體化的深化發展，所牽涉的問題從經貿擴大至人權、性別、正義、環保、軍事安全以及移民等等，這些議題所關注的不再是利益如何生產與分配，而是人們對自身的理解與生命價值的探索。同時由於交通和電腦資訊的發達，以及旅遊與移民的增加，歐洲人民對於自我與他者間關係，或異文化的衝擊，都必須以一種新的態度或思維加以面對。這就是 90 年代以來建構主義理論興起的背景，且對歐洲區域主義的解釋越來越多。

一、多層次分析

在傳統一體化理論當中，聯邦主義沒有說明為何國家願意讓渡部分主權給超國家機制，卻同時可能失去對其之控制；而政府間主義強調成員國政府在一體化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並認為國家的偏好是預先設定的，而忽略其可能是國內相關利益團體的因變量，兩者同樣沒有考察國內政治的變化及其對一體化進程的影響。相較之下，雖然功能主義注重社會面向，認為國家間經濟文化的交流整合會自然的「外溢」到政治領域，但此無法解釋歐洲整合為何在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會發生相對停滯的現象。會造成這種缺失的原因之一，就是傳統一體化理論均從單一層次分析問題。80 年代中期以來的新區域主義理論強調，必須同時觀照超國家機制、主權國家和國內利益團體三者互動結果對整合的推進作用，才能解決上述傳統理論的缺失。

莫拉維斯克 (Andrew Moravcsik) 首先將功能主義與政府間主義作一結合，提出一種自由政府間主義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的理論，該理論採用兩階段的方法來解釋歐盟的重要決策：第一階段，各國政府先釐清國內利益團體的偏好是什麼，然後再以此為底限與其他國家談判；第二階段，國家間的討價還價結果取決於各個政府的相對談判實力、交易成本和控制國內事務的願望所激起的建構超國家機制的動機。²⁰顯然這種看法引進了自由主義的觀點，來改善傳統政府間主義對於國家偏好自外於國內政治的假設缺失，但另一

²⁰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p.18.

方面在國家間談判中，國家似乎又成了統一的理性行爲體，代表談判的政府首腦被假定爲沒有自己的偏好和獨立的政策觀點，在這一點上莫拉維斯克又回到了現實主義的立場。同時自由政府間主義也沒有說明，談判後所建立的制度或超國家機制是否會對後來的國家偏好或政府間談判產生回饋的影響，也就是忽略歷史因素的作用，歷史是連貫的，不能斷章取義，此問題正是後來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所要論述的重點。

歷史制度主義認爲，各成員國協商談判建立超國家制度或機制時都想極大化其利益，但是再理性的國家或政府也不可能掌握、吸收和消化它做每一決定所需要的資訊。尤其儘管成員國政府在推動一體化的協商或條約談判時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但這些協議的內容通常是極爲籠統、含糊，目的是希望能顧及所有參與國的立場和意見，容許一些解釋的空間，確保談判不致破裂。在這種籠統模糊的情況下，當未預測到的變數發生時，成員國在先前所作的決定是很難控制住超國家組織在後來的發展的。²¹此時爲了避免整合功虧一簣，讓先前努力付諸流水，成員國常會放棄原先的立場。當然歷史制度主義理論的運用也有其困難之處，包括：由於不易追溯政治談判者的動機，因此很難區分「預期結果」與「非預期結果」；對已投入成本於決策過程的影響也不易界定；及研究長期的政策歷史發展過程是相當辛苦的等等。

如果說政府間主義論述中的國家同時具有對內與對外的自主性，那麼自由政府間主義中，國家對內的自主性是受到利益團體的限制，但仍保有其對外的自主性，這種看法是採行兩層次的分析方法（國內與國家），而忽略國際層次的作用。相較地，辯證功能主義則認爲一體化是國內利益團體、主權國家以及超國家機制三者間相互作用的結果。辯證功能主義是新功能主義的修正，新功能主義認爲一個功能性領域的整合將會導致相關領域整合的需求，並形成政策的功能性連結。辯證功能主義則主張國家不會完全放棄與整合有關的政策目標，當一整合政策制定時，成員國爲了在與整合政策相關之領域保護其主權之

²¹ Paul Pierson, "The Path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9, No. 2, 1996, p. 137. 盧倩儀，〈區域整合理論之比較與評析〉，《歐美月刊》，第12卷第1期（1997），頁35。

行使，或提昇國家對外的競爭力，會傾向增加在相關領域的介入，一方面作為對失去自主性部分的補償，另一方面也可改善國內產業對其他國家的競爭力，來維持其統治的合法性。²²如在廢除關稅共同政策下，國家可能透過補貼或其他非關稅障礙的方式來保護國內的產業，此時整合過程就會出現停滯階段。

然而每個國家保護國內利益團體的政策或有不同，但激烈競爭下沒有國家會得到好處，甚至產生負面效果。此時解決困境的方法就是透過超國家機制來制定新的整合政策，於是新一輪的整合過程又開始了。簡言之，是由於各成員國在相關領域的政策競爭，最後才導致彼此間政策偏好的聚合，而非如新舊功能主義所宣稱的是「外溢」或「分枝」的結果。整合並非一直線的歷程，而是走走停停的梯形發展狀態。此外，辯證功能主義亦認為，除了超國家機制和國內利益團體會形成聯盟來共同對抗成員國之外，成員國政府亦可能結合超國家機制來抗衡國內利益團體的壓力，政府可以利用其在超國家機制或會議中所承擔的義務和受到的壓力，來削弱國內對一些不受歡迎的調整措施的抵制，並爭取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整合過程當中超國家機制並非如自由政府間主義所言，僅是國家極大化其利益的工具，而是會追求自己的權力和自主性。²³從上述的討論可知，相對於自由政府間主義的兩層次分析研究途徑，其中主權國家政府位於中心關鍵位置，辯證功能主義是採行三層次的分析方法，裡面主權國家、超國家機制與國內利益團體三者是處於合縱連橫的狀態，沒有任何行為者具絕對的支配性地位。不過兩者同樣對於國際機制創立的可能性及其內容是由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共同決定的看法，可以補充國際機制理論所強調的，國家基於理性自利的考量，會建構或參與國際機制，以實現國家利益的觀點。

當然，辯證功能主義在操作上也非全然沒問題，例如沒清楚說明所謂的相關政策領域所指的範圍是什麼？以及如何及由誰來判斷政策的競爭性已產生負面的效果，須進行下一階段的整合，是政府或民間利益團體？不同的政策是否有本質上的差異？這些問題或許僅能透由累積更多的個案研究分析後，才能

²² Dorette Corbey, "Dialectical Functionalism: Stagnation as a Booster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2, p. 263.

²³ *Ibid.*, pp.268-269.

找出較通則化的答案。

二、認知或建構主義

近來對一體化研究的另一個趨勢是建構主義的興起。過去功能主義樂觀地以為，只要國家間經濟交流增加，主權國家滿足人民需求的能力反而會下降，此時人們將會把其傳統上對國家的忠誠認同自動地轉移至超國家機制上，而忽略一體化或地區化不僅是物質上同時也是觀念上的建構。至於政府間主義與自由政府間主義更是一種國家中心觀的論述，假設國家是主要的且是理性的行為者，國家利益的偏好與選擇是外生的東西。但正如建構主義所指出的，偏好可以是國家與其所處外在環境之間相互建構形成的。所謂的國家利益並不必然是依循「客觀」存在的物質利益來算計，而可能是國家彼此間互動認知或詮釋形成的，因此應把成員國利益的建構過程作為主要分析對象。此外，對於一體化的進程研究，學者貝那薩（Bela Balassa）曾依整合程度的差異提出五項不同的型態，包括自由貿易協定、關稅同盟、經濟共同體、經濟同盟以及貨幣同盟等等。²⁴這種劃分法無疑是僅以經濟合作面向來思考，大致上還能符合 80 年代以前歐洲一體化的經驗。然而近來新區域主義的興起，其所牽涉的面向有轉往社會層面的趨勢，並且所關心的不再是以前的經濟發展或利益分配問題，同時更涉及到認同的問題，經濟交流僅是區域整合的前提或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整合的落實還有賴人們對區域的認同。

不滿於上述研究理論或分類的標準，1980 年代中期以來，可以看到一些學者參考建構主義的觀點，對一體化的進程提出新的參考指標，例如赫立爾（Andrew Hurrell）提出新區域主義的五種現象：即地區化、地區意識與地區認同、地區間國家合作、國家推動地區一體化和地區統一。²⁵而赫特（Bjorn Hetten）與索德伯姆（Fredric Soderbaum）則提出理解區域主義「地區性

²⁴ Bela Balass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Brent F. Nelsen & Alexander C-G Stubb, eds., *The European Union: Reading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²⁵ 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pp. 37-73.

(regionness)」的五個層次，包括地區區域、地區複合體、地區社會、地區共同體與地區國家。²⁶赫特和索德伯姆明白指出，這五個層次的分析並不是爲了提出一個階段理論，因爲對區域主義來說，沒有任何因素對區域主義起決定作用或本質上就是進步的，進程是由許多因素共同推動的。不是依次超越一個又一個階段才能出現更高的地區性，很多地區化是從地區性的不同起點開始。²⁷從這些觀點可以看出建構主義在新區域主義解釋中的應用，其關於文化、規範、身分、認同制度與共同體等方面的闡述對新區域主義的實踐理解是有相當大的助益的。

伍、區域主義理論之展望

除了上面所提到較爲熟悉的理論之外，新區域主義研究至少還可以有幾方面的發展：第一、世界體系理論觀點思考。隨著新區域主義的發展，西歐、北美和亞太等三大主要的板塊持續地向外擴張，進而在每一區域內形成核心、半邊陲與邊陲的分工狀態。以歐盟爲例，無論從國民年平均所得或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來看，西歐、北歐國家是屬於核心國家，其經濟結構主要是資本、技術密集產業或其他金融服務業；希臘、西班牙與葡萄牙等南歐國家，則是以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爲主的半邊陲地帶；而正在陸續申請加入的東歐國家，則是提供廣大新興市場與廉價勞動力的邊陲國家。如果歐盟的經驗能夠證明區域內的邊陲國家也有發展的可能，而非落入依賴理論或世界體系論所說的不發展狀態，那麼其成就或許可以成爲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或東亞模式以外的另一發展理論新模式，這對亞太與美洲地區的邊陲國家應該會有吸引力去加入整合工作。過去對歐盟的研究太偏於政策或機構本身的探討，而較少對歐盟國家間在一體化下經濟分工的狀況及其結果之分析，這是值得研究的領域。

此外，東盟國家的發展經驗－以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爲主軸（和過去拉美國家的進口替代不同），輔以集體談判策略以減輕核心工業化國家的可能宰制

²⁶ 赫特與索德伯姆，〈地區主義崛起的理論闡釋〉，《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1期，頁66-71。

²⁷ Ibid., 頁70。

(和過去東亞四小龍主要透過雙邊方式和核心國家談判不同)——是否能替第三世界國家提供新的發展模式，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這應是研究亞太區域主義，特別是觀察東盟次區域作為一個整體所推動的十加一、十加二、十加三或者亞歐會議，所不能忽略的重要問題意識。

第二、國際政治經濟學，特別是英國學者史翠菊 (Susan Strange) 的結構分析途徑的運用。傳統區域主義理論常將政治與經濟視為兩個可以平行運作的領域，而少談論彼此之間互動的關係。例如，新舊功能主義認為可以先迴避主權問題，國家間經濟部門的功能性整合，最終會「外溢」或「分枝」至政治領域，而達到政治整合的目標；政府間主義則視國家為推動區域一體化的主要行為者，且相對於國內利益團體及超國家機制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性，是一種國家（政治）中心分析途徑；而自由政府間主義雖然結合國內政治與主權國家兩層次的分析方式，但仍缺乏國際經濟因素對國家行為影響之研究。近來雖然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國際政治環境對經濟一體化的推進作用，例如，格理科 (Joseph Grieco) 把地區安全結構的穩定或不穩定視為部分地決定地區經濟合作機制形成的先決條件，²⁸而曼斯菲爾德 (Edward Mansfield) 與高瓦 (Joanne Gowa) 則特別研究了政治、軍事聯盟和其他政治因素對雙邊貿易的影響，²⁹但這些仍屬國際政治對國際經濟單向作用之研究，而非彼此間互動關係的討論。

針對上述的缺失，英國學者史翠菊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應該打破過去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研究方式，而將國內與國際分析層次、政治與經濟議題領域作整合性的探討；同時反對美式的「國家中心主義」與「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研究取向。在其《國家與市場 (States and Markets)》一書中，其提出一個替代式的研究綱領，認為人類社會正是圍繞安全、財富、自由與正義等四大基本需求的安排與再安排而組織起來的，國

²⁸ Joseph Grieco, "Systemic Sources of Variation in Reg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East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Edward Mansfield and Helen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97), pp.164-187.

²⁹ Edward Mansfield,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Reg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Kym Anderson and Richard Blackhurst eds.,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pp.199-217. Joanne Gowa,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4.)

家的性質也是取決於對這些需求的安排方式，因而國際關係所反映的不單單是抽象的國與國之關係，而正是這四種價值結構（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和知識結構）互動的結果。市場和國家在每一個結構中都發揮作用，雖然作用的方式、範圍與強度都不盡相同。就一體化的研究而言，這四大結構為新地區主義的實踐提供了場所，從而可以為我們進行區域主義研究時提供有用的分析框架。例如，可以觀察歐盟、北美或亞太區域主義的根源與動力如何受到各該地區四大結構的變動與互動的結果影響；以及全球主義、區域主義與民族主義相互作用的結果，又如何推動各地區四大結構進一步的變遷。更具體而言，東亞金融風暴之後，美國霸權勢力從返亞洲，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以及世界銀行（WB）貸款條件所附之經濟結構調整方案以及東盟國家對主權不干涉原則的重新思考等等，在在顯示史翠菊的「結構分析途徑」可以是新區域主義研究的有用工具。

第三、區域主義研究也可以一些概念，如「利益」或「國家自主性」等為核心，進行不同時段或同時段的理論比較研究。例如，以「國家自主性」為討論焦點可以發現，政府間主義的國家不論是對內或對外均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性；自由政府間主義的國家則是其對內的自主性受到國內利益團體的制約，但仍認為國家為一理性的合一的行為體，並保有對外的自主性；而辯證功能主義的主權國家，是與超國家機制以及國內利益團體處於三角的合縱連橫關係，沒有任何一者能擁有絕對的支配地位。當然，想進一步理解「國家自主性」的內涵，有必要回到（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傳統中去搜尋。特別是法國學者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辯證結構主義觀點，將國家本身視為階級鬥爭的場所，而非階級鬥爭的產物；德國學者奧菲（Claus Offe）將國家視為資本主義危機的管理者，並且會追逐自身的利益，而非僅是服務資產階級利益的工具；以及史卡西波（Theda Skocpol）從歷史結構的角度（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認為，即使最初的動因來源於私人領域，國家在組織結構上的不同，必會影響政策的結果等等這些看法，對於分析區域主義諸理論有關政府偏好的形塑問題時，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參考論述。特別是東亞的台灣與韓國近年來的民主化運動，以及東南亞強人政治的轉型，包括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退居幕

後、印尼蘇哈托總統的下臺、以及馬來西亞瑪哈蒂總理準備移交政權，均會影響國家對內的相對自主性，這是否將會影響東亞區域主義的未來運作，值得觀察。

第四、功能主義認為人類共同需求的滿足，必然會逐漸地由超國家機制的技術管理來取代主權國家的統治而實現，最後一個國際的市民社會會自動浮現，人民也因而會轉移對國家的忠誠認同。而溝通交流理論則是認為，經貿、文化、旅遊與通訊等互動的增加，會加強人們彼此間的學習了解，進而形成「共同體意識」與達到「安全共同體」的建立目標。最後，建構主義主張「地區性」或國際典則的內涵並非客觀的存在，而是人們或國家彼此間相互主觀建構而成的。這些不同的看法，不是將經濟運作與政治運作分開處理，就是忽略權力因素在形成「安全共同體」或相互主觀建構意涵過程中的可能作用。會產生這樣的疏漏，原因之一就是這些理論缺乏階級分析。事實上，正如新葛蘭西學派（Neo-Gramscian School）的提醒，後冷戰的國際政經秩序並不是兩極結構的瓦解與美國霸權地位的確立，而是正形成一個新的歷史統治集團，包括核心國家政府、跨國公司、國際經貿組織以及被投資國的貴族勞工等等，透過其掌握的國際傳播媒體，論述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正當性與不可拂逆性。因此，東亞區域主義中的區域治理或政策網絡研究，也可以從階級分析的角度切入探討。

陸、結論

區域主義的發展實踐是既快速又複雜的，我們無法一一親臨經歷，只能從許多其他人的經驗口述中，或電視等傳播媒體之報導中略知一二。除此之外，區域主義的理論研究是對具體事實的抽象，雖然可能失真，但只要將理論與事實時時對話，就有可能對事實多一份了解，同時檢討以往的理論使其「逼真」。本文就是基於這樣的想法，重新回顧了歐洲一體化進程研究的一些主流論述。發現每一個理論承載不同的目標價值與不同的問題討論面向，並沒有絕對的對或錯，僅有在不同的時空裡，適用上的解釋力可能會有不同而已。同時認識到重新思考過去的理論，或將其作新的後設分類，會有新的發現與體會。

大體而言，區域主義的理論研究基本上還是免不了受到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影響。國際關係研究總共歷經了四次的大辯論，即二次戰前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對抗；戰後 50、60 年代傳統主義與科學行為主義有關研究方法的爭論；70、80 年代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辯；以及 90 年代以來實證主義與后實證主義有關方法論的競逐等等。毫無疑問，這幾次大辯論也刺激區域主義研究的發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所謂的四次大辯論也僅是主流（特別是美國）學者的後設歸納而已，並不全面。例如，新舊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就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然其「國家自主性」的概念對於理解政府偏好的形塑過程是相當有助益的，而世界體系理論與新葛蘭西學派的一些觀點，也都能幫助思考全球化下區域主義所產生的問題。又例如，歐陸學者史翠菊的結構分析途徑，或者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理論，對於區域主義研究而言，都是值得開發的新領域。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Yi-Ren Dzeng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view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kinds of research results about European unification experience in academic society. This study found that every regionalist theory had its own special purpose and had from different angle to deal with European integration issues. There is no single theory can explain whole story of European experience. Different theories had different explanation abilities. In general, the study of regionalism had been influenced a lot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he so-called 「Four Big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had stimulated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ism more or less. Like main stream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udy of regionalism neglected some important approaches including neo-Marxism,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ory of English School and Susan Strange's structuralist analysis. Doubtlessly, these approaches worth us to do mor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t study.

Key words: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European Integration

